

黄河 河套史 文明

王天顺 著

人民出版社

The title is presented in a three-part vertical arrangement. The top part, '黄河' (Yellow River), is in a large, bold, sans-serif font with a 3D effect, set against a dark grey rectangular background. The middle part, '河套史' (History of the Hetao), is in a white, bold, sans-serif font, centered within a solid black horizontal band. The bottom part, '文明' (Civilization), is in the same large, bold, sans-serif font with a 3D effect as the top part, also set against a dark grey rectangular background. The entire central composition is flanked by two vertical panels showing a textured, greyish surface that resembles water or a rocky riverbed.

黄河
河套史
文明

王天顺 著/张秀平 策划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张秀平

装帧设计:徐 晖

责任校对:吴志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河文明史书系·河套史/王天顺著,张秀平策划.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

ISBN 7-01-005244-1

I. 河… II. 王… III. 黄河—河套—文明史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8869 号

河套史

HE TAO SHI

王天顺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河北永恒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9.25

字数:450 千字 印数:0001—3500 册

ISBN 7-01-005244-1 定价:39.90 元

黃河文明史探索之一

河套地區人地關係演進之歷史考察

林幹

乙酉年夏
于呼和浩特

绪论 黄河与河套

一、黄河百害，唯富一套

人类把自己从大自然中剥离出来之后，就和大自然构成一对矛盾范畴。世界各民族在各自不同的自然环境条件的规定下，选择了自己的文明道路。其文明的创造和演化的历史过程，既是人类与大自然矛盾运动的结果，又是这一矛盾运动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的表现形式。黄河人与黄河就是这样一对矛盾。生息繁衍在黄河流域的先民们及其子孙流裔，既接受了黄河博大而丰厚的恩赐，又世代前仆后继地与黄河作斗争，从而创造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几个伟大的古老文明之一——黄河文明。世界上几大古文明皆肇兴于大川巨流或他们支脉的侧畔。这些文明及其创造他们的民族的命运有幸有不幸。有的没有延续到现在，随其古代历史的结束而衰落下去。如发祥于尼罗河畔，几经繁盛的古埃及文明；有的曾辉煌一时而中途夭折，如迭兴于亚洲西部两河流域的亚述文明和巴比伦文明。比较而言，黄河与黄河人是幸运的，从黄河流淌出来的伟大文明，如同黄河本身一样源远流长，生生不息，至今仍然奔涌着旺盛的生命力。中国人深情地称黄河为自己的母亲河。黄河恩赐给她的儿女们膏润深厚的黄土，在上游和中游冲刷，积淀而形成千沟万壑，肥硕无比的黄土高原；在下游经过千万年无

数次决、溢、改道、冲积而成坦荡无垠的华北大平原；在上游的下段和中游的上段风沙之区流过，又特别眷顾她这里的儿女们，馈赠给他们宁夏平原和内蒙古河套平原以及长城内外辽阔的大草原。但是黄河母亲并不让她的儿女们依偎在自己的怀抱里平安地长大，她的性格喜怒无常，不断地用滔天的洪水灾害捶打着儿女：从西汉文帝时到民国二十七年共 2106 年间，有记载的黄河决口 1590 次。清末民国不足百年，河患转剧，竟至一年数决。自有文字记载以来黄河大改道就有 26 次。暴怒的黄河在东部中国 25 万平方公里的沃野上恣意摆动她的巨尾，一次又一次倾覆淹没掉烟树如织的村镇，阡陌交错的田园和繁富喧闹的都市。黄河儿女们被洪水驱赶着四散逃奔，北到津、平，南到交、广，东到江浙，西到关中，处处可以见到豫、皖、冀、鲁的灾民，背负肩挑，老幼相扶，疲惫地行走在逃荒的路上，这是封建的士大夫们在他们的书、论、章奏、诗文中屡屡道及的。黄河急匆匆地走下平均海拔 4500 米以上的青海南部高原，百折千回奔向黄土高原，一路上挟带巨量泥沙倾泻到下游去。黄河干支流日夜不休地冲蚀切割着质地松软的黄土地，岁月绵邈不啻千万年，把本来完整肥厚的黄土高原刀刻斧凿般雕塑成皱纹密布、岗阜突兀、沟谷深陷的一幅悲苦而又坚毅的面容。黄河流经黄土高原，把大量泥沙输入下游，每年输沙量随代不同，明显地呈增长趋势。全新世中期，每年约有 9.75 亿吨泥沙泻入下游，进入历史时期，随着人类活动的干预日益强化，从西周到金代，年输沙量增至 11.6 亿吨，明清时期是 13.3 亿吨，20 世纪以来达到 16 亿吨。所以，古有“斗水泥七升”之说。明代水利专家潘季训，在秋季洪水期，经过实地测算，竟云：“二升之水，载八升之沙”^①，黄河中上游产生的越来越多的泥沙，既是下游河床淤积抬高造成水患频仍的根源，又意味着中上游流域的植被越来越差，环境日趋恶化，致使这一地区虽无黄河决溢之患，亦有旱涝不均而频生饥荒。黄

土高原上的黄河儿女们被饥荒驱赶着背井离乡,高原东部的晋、陕贫民越长城,“走西口”;西部的甘、宁贫民近套者入套,近河西者则走凉、甘,度玉门而远投西域。黄河母亲寿与天齐,黄河儿女的逃荒史与黄河历史的进程相伴随,这是中国移民史上令人悲怆的一页。黄河儿女们生生死死,永不离黄土地。下游黄泛区的灾民们在洪水过去之后,又回来重新开始耕垦树艺,营建栖居之所;被饥荒驱赶着抛家舍业,流落他乡的高原儿女也是在寻求可以开垦的黄土地,仍然要把血汗抛洒在被黄河浸润过的原野上。

典型的例证就是开发和延续河套地区农业的人,正是到这里来寻求可以开垦的黄土地的黄河儿女,当然也有历代封建政府实边政策下迁入的农民,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因河患而安置在这里的黄河人。黄河人与黄河就是这样不可相离的一对矛盾。黄河用无数的灾难锻造着她的儿女,儿女们也在经历磨难中锻造着黄河文明,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文明。这也许就是黄河文明能够绵延至今,仍然特别富有生命力的原因。

黄河自古以善决、善淤、善徙著称,其所造成的无数次灾难基本上都发生在下游流域。理论上,今河南孟津县以下为黄河下游段。自孟津到武陟一段,由于山脉约束,河道摆动不大,黄河自桃花峪进入华北大平原,至入海口,主干道长达 768 公里,历史上黄河的决溢改道主要在这一段。这条金色的巨龙在北到海河,南到淮河的广阔平原上任意滚动着身躯,吞噬过无数生命财产。历代人民在这里反复地堵口、垒堰、导流,经过 2000 年的殊死搏斗,筑起千里长堤约束黄河,而祸难依然频临。相反地,位处上游下段,中游上段的河套地区却因为有了黄河而成为福地。黄河干流自今宁夏青铜峡市的峡口进入此区,到今陕西省府谷县的黄甫川口流出此区,全长 1212.5 公里,流域面积约为 13 万多平方公里。这里正是我国西北部干旱风沙之区,黄河缺少地表水流的补充,径流量

不大。入套以后,在贺兰山东侧、阴山南侧的地质断堑形成的狭长低地上流过,河口镇以下,又在山陕峡谷中穿行,故无冲决堤岸之虞;黄河流过贺兰山石咀子、北抵狼山一段西岸地势低洼,河水溢出成湖,此即古屠申泽,非但不为灾,而且湖周围在汉代就被辟为垦区。黄河再东行,经临河、五原、土默特左旗、托克托县河口镇段,多为土岸,受流水冲蚀,易崩塌,河道时有摆动,洪水期亦有小灾,但没有如黄河下游的滔天洪水造成千里汪洋。坐落于黄河北岸的包头市区与位于黄河南岸的昭君坟古渡夹河相望,岸基为岩石构成,渡口稳定,这使包头成为连接河套内外的交通枢纽,近百年来发展成为河套地区著名的大商埠;坐落在前套平原上的呼和浩特市和银川平原上的银川市,都因为黄河文明之光的照耀而成为历史名城。黄河流经河套地区,沿路滋润着银川平原 297 万亩耕地和内蒙古河套平原近 800 万亩良田,此外还有难以计数的陕北高原沿长城一线零散分布的河谷小平原。这一带正是风沙干旱区,有了黄河,都可以不待降雨而可获丰稔。此段黄河干道全线可以航行木船,自古即有舟楫之便。所以,中国久有“黄河百害,唯富一套”之谚。黄河之于河套儿女,恩泽之厚,可谓天下无双。可是,纵观黄河文明史的进程,与黄河上游流域的黄土高原西部地区,中游流域的黄土高原腹地相比,与黄河下游流域的华北平原相比,这里的黄河文明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积累都不够丰厚。黄土膏腴,草原丰美,文教却时时荒芜。当然随时代不同,情况也有差异。自上世纪 20 年代以来,考古学家们陆续在这里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原始文化遗存,证明河套地区是世界古人类最早的栖息地之一,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不用说,这里发现的丰富的密集的原始文化遗存应是黄河文明的源头之一,是这里的人们值得夸耀的文明史上的亮点。另一个值得夸耀的亮点是持续 2000 多年建设成的引黄灌溉农业区。灌区的基础是汉唐强盛时打下的。汉唐强盛

时对河套地区大规模经济开发是各族人民共同进行的,曾出现农牧业经济互补并兴的局面。但是那时及以后各代封建王朝在这里的经营,着眼点都在于边防,目的是阻遏游牧民族入塞南下,经济开发服务于军事需要,因而未能措意于文化方面的建设。留下来的遗迹最明显的是秦、汉、隋以至明各代所筑长城以及隐现在白沙荒草之中的烽墩、堡邑。西风古塞的壮观之中,透出幽远深邃的萧索。汉、唐强盛时的移民、屯垦等经济活动,金戈铁马的军事活动以及牛马衔尾的牧业兴旺景象毕竟构成了黄河文明史有声有色的一页,故为以后的人们所乐道想往。

当秦汉王朝动员人力大规模开发河套时,铁器、牛耕已经普及,人们干预自然环境的能力已空前增强,随之而来的是森林面积急剧缩小,草原不断被开垦,人工农业植被不断地取代林草自然植被,已经裸露的黄土地风蚀、水蚀日趋严重。起初自然植被的破坏程度尚轻,尚能有恢复之机,中唐以后,自然植被的恢复就再也没有机会,而进入了沙漠扩张时期。到了明清时代,在河套地区,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已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黄河在这里一直沉默着,却在下游频发河患,对人类施以报复。在河套地区,大自然的报复手段是荒漠化,使这里由远古时的人类文明发源地变成了河患发源地。荒漠化甚至危及黄河,它通过风力营运和河水冲蚀,把大量泥沙倾入黄河,又通过黄河输入下游。黄河自身则径流量减少,以致在引黄灌区出现水荒,黄河上游和下游都出现断流。据新闻报道,黄河上源,号称天下第一曲的青海玛曲县境内黄河弯曲处于 2001 年已经出现 30 公里断流。两岸原先水草丰美的高原牧场已退化,如茵的牧地已成一片干涸的砾石荒滩,牧民只得远徙他处谋生。至于下游断流,近些年已屡有报道,按年份不同,断流长度不一,时而 80 公里,时而 170 公里。人们早已见怪不怪了。主流干道全长 5464 公里的东方巨龙,现在被斩头去尾,长此以往,我们

伟大的母亲河岂不要被截为数段,变成内陆湖或不能出海的内流河吗?稍微关注一下环境问题的中国人都免不了有此杞忧。但愿这只是“杞人忧天”,然而事实一再警示却令人忧心忡忡。河套腹地鄂尔多斯高原是地球上著名的古陆之一,它的年龄已有 36 亿岁,在地质年代,自然黄河的初孕和生成与这片古陆的隆起有密切关系。地质考古的结论明确地告诉我们,黄河从鄂尔多斯断块周缘断裂系的内陆湖泊演化而来,由此形成黄河“几”字形大弯曲,河套遂为黄河所环抱。时间大约在距今 200 万年到 100 万年之间,恰是早、中更新世交接之际。^② 这片参与催生了黄河的古陆曾经是湖沼密布,草茂林丰的古代动物乐园和古人类栖息耕牧的理想场所。黄河文明的先驱,著名的萨拉乌苏文化就在这里。而如今这些文化遗存的所在,早已是毛乌素沙漠的一部分了。孕育了萨拉乌苏文化的萨拉乌苏河,古名奢延水,源出奢延湖,唐以前源清流清,风光秀美。唐以后由于过度开垦,上游流域变成沙漠,水流浑浊,河床摆动,故更名无定河。黄河在河套地区的这条最大的支流遂成为输沙量最大的支流。母亲黄河深情眷恋地拥抱着鄂尔多斯,却几乎从鄂尔多斯得不到地表径流的水量补充,无定河倾泄入黄河的多半是泥沙。黄河流经河套这一段,对儿女的赐予是丰厚的,而自己却是贫穷的——它少水而多沙。自然黄河的这一段流程既然如此,黄河文明在河套的进程从而也是艰难的。其步履艰难就在于生态环境在近 3000 年来趋于恶化,这一方面是气候干旱化的自然因素在起作用,另一方面是人类活动的过度繁剧加重了气候因素的影响。而人类对自然环境变化的干预日甚一日,近一千年来竟居于环境恶化趋势诸因素的主导地位。另外,一般人认为黄河文明就是农业文明,这个论断在河套地区不完全适用。河套地区本是农业文明与草原文明交会之地,也是草原民族与农业民族杂居之地。历史上此地民族关系复杂,冲突迭起。民族关系的好坏

直接影响到黄河文明的进程。在该地区则多次出现农、牧业生产方式的交替,胡汉民族多次迁入迁出,人口忽增忽减,农牧经济时起时落,文明进程时断时续。人类任何一种文明都不能突击创造,也不能凌空跨越,文明的流程是历史的积淀。黄河文明在河套地区艰难地行进,积淀下来的是今日经济文化的落后局面。究其根本原因,乃是人类与自然这一对矛盾互相推演的结果。考察这一矛盾运动的过程是黄河文明史题中应有之事。笔者认为河套地区自然与人文的历史,能够比较清楚地反映人与自然环境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演化轨迹及其在矛盾发展的不同阶段上的表现形态。

当人文初兴之时,人类只能在自然环境既定的条件下生存和活动。这时候,大自然居于矛盾的主导地位,自然主宰着人类,人类只是大自然的附属物。这个时期年代绵长,我们姑名之曰自然时代。自此之后,便进入人类时代,人类时代依人与自然关系的状态又可分为若干阶段。当人类有了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当发生了第一次大分工:游牧业从中分离出去的时候,并且有了最初的社会组织,可以集体狩猎,集体抵御野兽侵害,甚至可以抵御一定的自然灾害的时候,人在大自然面前虽然表现出些许的主动性,但二者的关系处于和谐状态;当人类生产能力进一步提高,社会组织进化到国家形态,也就是结束野蛮时代而跨入文明时代门槛之初,人类便开始了对自然环境变化的干预,因为干预的程度较轻较浅,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有了轻度的不和谐,这个时期的开始在中国应以铁器牛耕的普及为标识,对应中国历史的朝代划分应在周秦之际,时间延续到唐代中叶。文明前行,到了唐中叶以后,轻度不和谐演化为明显不和谐;进至明清迄今,人类与他们的环境之间的关系已处于对立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立愈来愈尖锐。为了节省篇幅,现将这一矛盾演变的线索及相关联的诸因素具表如下:

远古和历史时期河套地区人类与自然关系演化表

时代	时段(距今)单位:年	气候变迁	生产工具	经济方式	植被变迁	关系状态
自然时代	100万~80万-----	干冷 温湿 温湿 干冷 凉湿 冷干	旧石器	采集狩猎 少量种植业	暖温带稀树草原,第四纪草原开始向半荒漠,荒漠草原转变	人类依赖自然
	56万~46万-----					
	14万~7万-----					
	7万~5万-----					
	5万~2.5万-----					
	2.5万~1万-----					
人类时代	8500~7500-----	温湿 温干 温湿 暖干 凉湿	新石器;木、石、铜并用	原始农业发生,农牧分工,以牧业为主	西部干草原,中部草原,东部和东南部森林,山体皆覆盖森林,少量人工植被	和谐
	7500~6500-----					
	6500~5500-----					
	5500~4500-----					
	4500~3500 夏商-----					
	3500~2500 商末西周春秋	温干	铁器牛耕普及	传统农业形成	自然植被保持	轻度不和谐
	2500~1800 战国秦汉	暖湿转冷干		农业为主	农业植被大规模取代自然植被,森林部分被砍伐,鄂尔多斯有流沙活动	
	1800~1400 魏晋南北朝			牧业为主	自然植被恢复期,河东沙区已存在。	
	1400~750 隋~唐中期	暖湿		传统农业全面 农牧业科学技术提高	农牧并兴	
	750~500 唐后期~元	冷干暖湿交替	蒙地牧业,长城内外农业		河东沙区东扩,乌兰布和沙漠北扩东进,库布其沙漠形成,毛乌素沙漠南扩,东南部丘陵沟壑区垦辟殆尽,森林大部被砍伐	
500~50 明~民国	冷干暖湿交替	农区扩展渐居主导地位	毛乌素沙漠越过长城,蒙地放垦,贺兰山、阴山山体外已不见森林,荒漠化加剧		对立	

上表只是粗线条地勾勒出河套地区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干预以及长时段气候波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这三者之间复杂关

系演变的大势,也可以看作本书主题最简单的表述形式。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荒漠化是现今河套地区面临的最急迫最严重的威胁,也是黄河文明面临的最大威胁。它不但威胁着根植于黄土地上,矗立于黄土地上所有的人类文明成果,而且威胁着黄河自身。近半个世纪以来,黄河下游河水被束缚在高悬于两岸平原上的人工堤防之中,但是决溢之患并未从根本上消除,河床高悬,犹如利剑高悬,黄河儿女仍不免提心吊胆过日子。相比之下,数百年来,未曾停止脚步的荒漠化甚至比黄河下游决溢之患还要凶恶可怕。在黄河下游干道两旁,由于堤岸高筑,阻断了许多入黄支流的归路,黄河径流的补充减少,汛期分流、泄洪愈益不畅。结果是黄河断流,两岸湖泊萎缩,个别地方,荒漠化已悄然降临。

河套地区的文明依傍着黄河走来,由于黄河母亲的深仁厚泽,这里才拥有了富庶的平原和曾经丰饶的牧场。历史走到今天,黄河母亲与河套地区都因为荒漠化而陷入危困之境。黄河与河套的关系就是如此。自然黄河亘古无言,日夜不停的涛声是她的喘息。她的儿女应作出怎样的回应呢?

二、河套安,天下安

黄河是世界上输沙量最多的河流之一,这是黄河善决、善淤、善徙,下游频生河患的根本原因。黄土高原是主要产沙区,而输沙量最大的河段在中游。按黄河水文考察,中游的划分,上起内蒙古托克托县南大黑河入黄的河口镇,下迄河南省武涉县南的桃花峪。黄河由此流入华北大平原,桃花峪往下紧接着就是1938年被国民党政府炸堤决口,造成黄河夺淮入海,横溢豫、皖、苏三省达9年的特大水灾的花园口。自河口镇往下到山西省禹门口,也就是陕西省韩城市北的龙门。原本东行的黄河遇到吕梁山高地的阻碍,在

河口镇急转南下,穿行于山、陕峡谷中,折冲奔突 700 多公里,落差 600 余米,怒吼着闯过禹门口。这一段流程的开头一段,即陕西省府谷县黄甫川口以上,约 220 多公里,在本书考察的河套地区河段范围内,此段黄河流程由鄂尔多斯和山陕黄土高原共同构成主要产沙区。山陕主要产沙流域 13 万平方公里,每年入河泥沙 9 亿吨,占全河挟沙量 56%。鄂尔多斯风沙区 1300 公里长的支流,每年接纳的风沙量就达 1 亿吨,1200 多公里长的黄河干流段,风沙进入黄河的量,平均每年 5000 万吨。这还不算黄河及其支流沿途冲蚀挟带的泥沙。因而,沿河两岸的沙漠是黄河输沙的重要来源。黄河上源植被较好,水是清的(现在早已不清)。青海贵德以下,流域内黄土输入,水渐浊,兰州以下,风沙较大,河中泥沙剧增。经过银川平原灌溉沉淀后,含沙量减少,河出石嘴山,乌兰布和沙漠直逼西岸,借风力把大量流沙倾泻入河,沙多时每年达 2 亿吨。河经后套灌区,流缓沙沉,河中含沙量减少,到河口镇减少到每年 1.67 亿吨,含沙量不足 6 公斤/立方米,到禹门口骤增至 28 公斤/立方米。从黄土高原(包括河套)产生的泥沙被黄河输送到下游河道,每年有 3 亿吨沉淀下来。河床因此逐年增高,河患不止。人工筑堤也逐年加高,愈高则潜在的危险愈大。

近两千多年来,黄河决溢频繁到平均不到一年半来一次,俗称三年两决口。这样频繁的河患在发生年代和灾情大小的分布上是有阶段性的。历史上有记载的大决大患,多发生于西汉武帝至王莽时期、唐贞观十年以后百余年间。北宋中期以后、明清两代,黄河下游决溢频次远高于前代。这几个时段,恰是河套地区人工植被大面积取代自然植被,森林急剧减少,荒漠化趋势明显和加剧的时期,而且时代愈往后,自然植被破坏愈严重。人类旷日持久地,过度繁剧的活动,使河套地区水土流失与荒漠化同步增长,二者同

时大量增加了黄河及其支流的输沙量。黄河决溢的发生自有其复杂得多的自然与社会的原因,决溢频次的分布自有其变异性,但不论何种原因,如何发生变异,其中都少不了泥沙含量多少、冲泄堆积程度这些变化带来的影响。总之,尽可能减少上游的产沙量和黄河干道的输沙量,是消除下游河患的根本出路。因而河套地区的环境治理是黄河治理的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河套安,才可天下安。

从人文历史角度看,河套确有系天下安危的区位重要性。在古人的地理概念里,河套是陕西的一部分。顾祖禹说:“陕西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又说:“陕西之在天下也,犹人之有头项然。患在头项,其势必至于死。”^③所论陕西地理形胜,就包括河套所占地利。顾炎武说,河套地“週迴六七千里,其土肥饶,可耕桑;三面阻河,敌难入寇而我易防守。故自古帝王及前明皆保有其地,以内安外攘而执其要也。”^④明清人论及陕西和西北边防大率如此,并且都举唐肃宗以河套为基地平定安史之乱,唐末党项拓跋思恭据夏州而缔造西夏国为例证,来说明河套俯视中原——扼天下喉舌的地理形势。事实上历代封建王朝都把经营河套作为巩固边防的要务。中央政府只要力量许可,都在这里筑长城,开营田而省国家边费。一旦河套有失,则北部边防全线吃紧,倾全国之力以弥缝之、捍御之而不足,是可谓河套不安,则天下不安。在汉、唐盛朝,河套是安置降附的少数民族之所;内地发生水旱饥疫,则河套成为疏散安置难民之所。这些问题解决得好,则朝廷可以安枕。所以,我们可以说:河套安,天下安。

现在的情况当然和古代不同,河套地区民族关系的性质和居民的民族成分都比之历史上有了很大的变化。由于数千年历史积淀,河套地区经济、文化比内地落后,有些地方已陷入生态性贫困。

消除贫困,摆脱经济、文化落后状况是河套人民的历史任务,也是河套人民的想往。从这个意义上说,河套小康,天下小康。

三、关注河套地区生态环境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战场硝烟尚未散尽,另一个殃及全球的灾难便悄然降临,这就是生态环境恶化问题。我国是世界上生态问题严重的国度之一,位处漠南长城中段的河套地区生态环境尤其脆弱。自古迄今,这一地区在脆弱的生态条件制约之下,在纷繁的民族冲突与战争的破坏之下,在始终无节制地、非科学地经济开发之下,经济从没有得到较长时期持续发展的机会。在我国,它至今仍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乃至贫穷的地区之一。近一千多年来,生态环境条件每况愈下,是制约该地区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稍作历史回顾,就可以看到,这里生态环境条件的优劣,古今差异是十分悬殊的。由于河套地区密迩中原,是北方游牧民族东进、南下的跳板,故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出于国防安全的考虑,无不下力气经营河套。顾炎武深以明廷弃套不守为恨事。秦、汉、隋诸王朝都曾大规模地往这里派驻军队屯戍,又移民实边,设郡、县以统辖之。魏、晋、隋、唐,亦于此兴修水利,广开营田。汉代人描述河套之美富说:“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穀稼殷积,又有龟兹盐池以为民利,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⑤未见有沙漠的记录。那时,河套四周山中皆为森林覆盖。“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⑥晚唐时的贺兰山,“山之草树,远望青碧如驳马。北人谓马之驳者曰‘贺兰’,故名贺兰。”^⑦东汉以后,文献中始见流沙活动的记载,唐时,毛乌素沙漠、灵武河东沙区都在扩展,明代,流沙猖獗,越过长城。至今,古代以水草丰美著称的鄂尔多斯草原几乎不复存在了。笔者不久前驱车过贺兰山、阴山,但见

荒山秃岭,从山体外面再也看不到蓊郁的森林。在五六月份燥热的旱季,唯见宽阔的黄河河道中有窄浅而浑浊的河水蠕动,其余大小河沟干涸的河底皆曝晒于骄阳之下。眼前的漠漠黄河和裸露的干渴土地,很难令人把一派生机的绿色原野和这里联系起来。河套地区正在经受大自然疯狂的报复。荒漠化的迅速推进,正是今天用来支付千百年来人类过度活动对大自然所负债务的代价。

在我国北方,沿长城一线,存在着一条漫长的,断续相间的绿洲经济带,这些绿洲分布于阴山南麓、贺兰山东麓、祁连山北麓和天山南北麓,流经山前的河流及泉、湖所在的沿岸。它们分别是内蒙古前套平原、后套平原、宁夏平原及靠近河西走廊的民勤绿洲、河西走廊绿洲群和塔里木盆地边沿、塔里木河两岸的绿洲群。这个绿洲带是我国北方生态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它是一个农牧业交错分布,对于生态环境变化十分敏感的地区。生态恶化,则农变牧,生态好转,则牧变农。农牧业区界不时南北摆动。历史上强大的中原王朝都竭力把农业区的极限拓展到这里,反之,游牧民族南进,则农作区线后退。北方大多数游牧民族政权把他们的势力,连同游牧经济方式推进到了这里,再继续外扩也力有不逮。于是这个地带便成了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政权相拒的缓冲地带,自然也成了传统农业区向牧区过渡的缓冲地带。这个地带对传统农业区在空间距离上起着保护作用;对于寻求生存发展空间的游牧民族来说,也是他们追逐的理想牧场。因而,北方游牧民族频繁的迁徙活动,与中原王朝的政治斗争、军事冲突以及官方、民间的经济往来,大多在这个地带进行。史籍所载,也大抵不出这些内容。至于这个地带各民族的生存状态如何?生态环境的变迁如何?生态环境的变迁与人类活动的交互作用又如何?这些问题从以往的史籍中是得不到解答的。近半个世纪以来,普通老百姓从媒体上得到